

忆念鲁迅先生

黄 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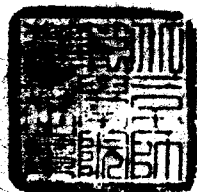
I 210.94/70

纪念鲁迅先生

黄源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1099

821099

忆念鲁迅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1}{4}$

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00

书号 10019·3188

定价 0.54 元

序 言

今年是鲁迅先生的诞生百年纪念，我汇编了四十多年来写的几篇纪念文章，定名《忆念鲁迅先生》作为纪念，献给我同样怀念鲁迅先生的读者。

这本小书的内容，有三部分。

一、鲁迅书简追忆，是对鲁迅先生给我的信，作些情况说明。写作的目的，是想通过信里的这些具体事件，看到鲁迅先生是如何正确地处理问题的。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申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我看鲁迅先生晚年的言行，包括给我的这些信，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要而言之，他的思想言行，正是符合我国国情，并根据不断发展的情况，经过调查，深思熟虑，实事求是地郑重处理问题的，所以无往而不胜。这些信中所述的，虽只是一些编辑杂志的小事，若能以小见大，领会他的原则，对我们处理问题，有所启发，这是我重印这书的唯一的愿望。

这部分最初在《西湖文艺》连载时，曾题为《关于鲁迅先生给我信的一些情况》，后来出版过二种单行本，一种改名为《鲁迅书简漫记》，另一种名《鲁迅书简追忆》，现在则沿

用“追忆”之名。

这次印行，重新校阅一遍，略有增补。

二、第二部分，计十篇。前面的六篇，都是鲁迅先生逝世时写的。其中有三篇是译文。《伟大的存在》，是日本内山完造在鲁迅先生葬仪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由我口译的。另一篇《鲁迅先生》，也是内山完造写的，是他为《译文》和日本《改造》杂志的特撰稿；日本鹿地亘的《鲁迅的回忆》，也是为《译文》的特撰稿。这两篇都是雨田翻译的。她是在鲁迅先生灵前连续三天守夜的唯一的女性。这三篇和我的《鲁迅先生与〈译文〉》，都载入《译文》哀悼鲁迅先生的特辑，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新二卷第三期。

《炮声中纪念鲁迅先生》，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时，为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而作的，大概发表在上海八一三战争后我们出版的《烽火》这文艺小型刊物上。《鲁迅先生纪念集》编成后，我就离开上海，回家乡，辗转奔投新四军去了。

《忆念鲁迅先生》和《杂忆老〈译文〉》，都是在一九五六年，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写的。前者发表于上海的《文艺月报》，后者发表于北京的《译文》。

《鲁迅先生与生活书店》，是一九八〇年，为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而作。

三、最后二篇，都是一九八〇年为“左联”五十年纪念而写的，纪念“左联”，离不开鲁迅先生，因此也一并编入此书。

鲁迅先生逝世数十年，我只写了这一点零星小文，真是惭愧无地，但事已如此，惶恐地谨献于读者之前，并请批评指正。

黄 源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于杭州

目 次

第一部分

鲁迅书简追忆	3
--------------	---

第二部分

活在青年心里	123
--------------	-----

伟大的存在〔日本〕内山完造作 黄 源译	126
---------------------------	-----

鲁迅先生	128
------------	-----

鲁迅先生与《译文》	141
-----------------	-----

鲁迅先生〔日本〕内山完造作 雨 田译	153
--------------------------	-----

鲁迅的回忆〔日本〕鹿地亘作 雨 田译	165
--------------------------	-----

炮声中纪念鲁迅先生	172
-----------------	-----

——为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而作

忆念鲁迅先生	175
--------------	-----

杂忆老《译文》	185
---------------	-----

鲁迅先生与生活书店	194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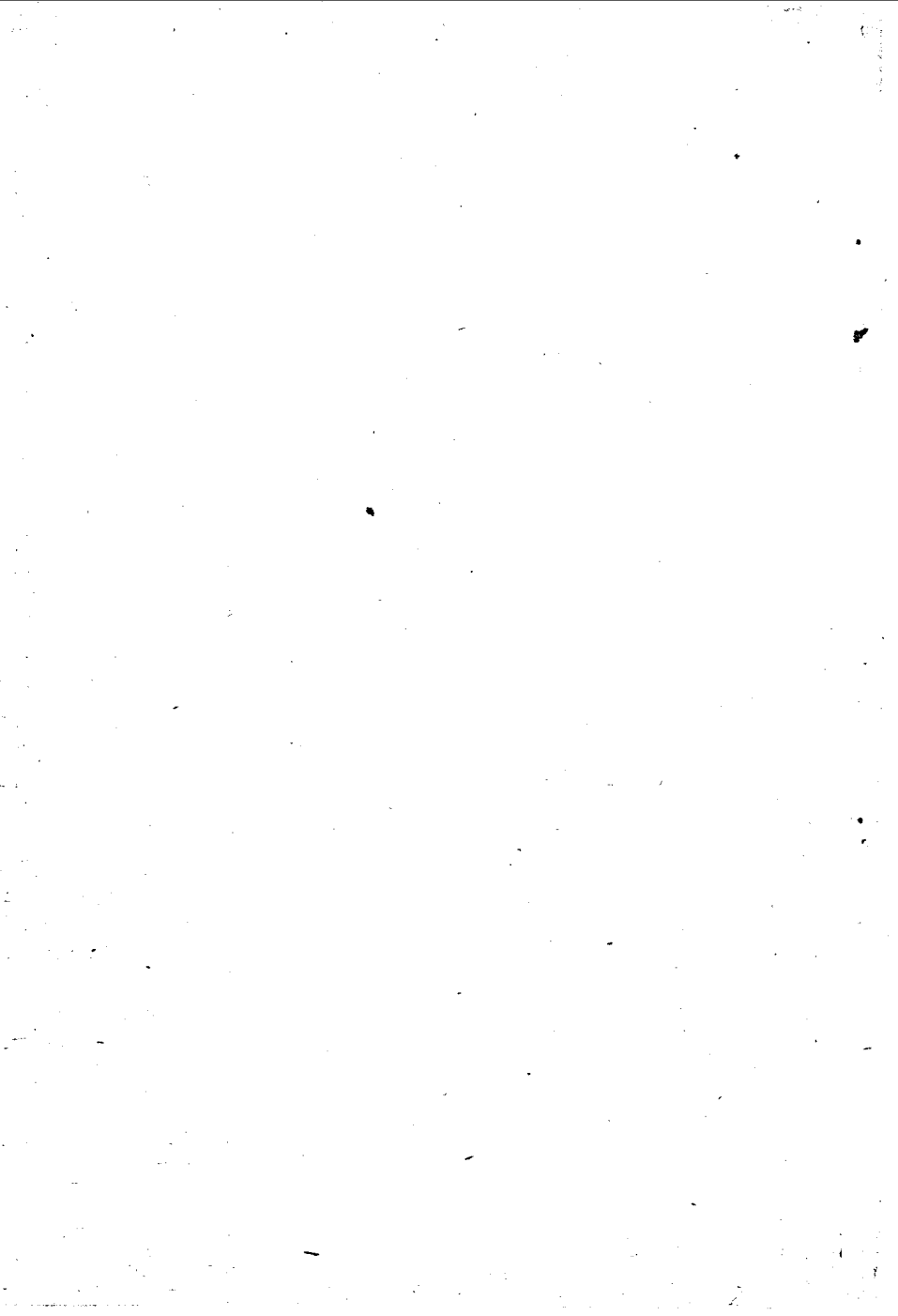
——为“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而作

第三部分

“左联”与《文学》.....205

一个“左联”战友的浅见216

第一部分



鲁迅书简追忆

引言

鲁迅先生给我的信，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三十八封（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夜写的第一封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夜写的最后一封）。这些信最初全部编入许广平先生编辑的《鲁迅书简》里，现在也已编入《鲁迅书信集》。

这些信，鲁迅先生写于战斗的最后三年间，谈的都是文学工作上的事，如对于《译文》稿件的处理，寄稿《文学》月刊，《译文丛书》的筹划，翻译《果戈理选集》的打算，《译文》的停刊和复刊，对付敌人的谣言攻势，等等，这些好象都是属于编辑事务性质的。事实上，鲁迅先生在指示怎样处理这些编辑事务时，首先考虑的是我们面对着的敌情和内部的关系，因此这些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中对付检查制度的战斗指示，具体体现着无产阶级的战略与战术思想。从鲁迅先生晚年的这些书信中，我们学习他在反“围剿”斗争中怎样对付敌人的战略，怎样处理阵营内部的人与事的关系。学习这些具体的战斗经验，有利于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问题，从战斗的实际出发处理问题。虽然这已是四十多年

前的事，其中有些事好象彼此无关，实际上是有联系的，并且是发展变化的，如其不在斗争中，较难知道底细。这些，我试图根据我当时知道的，后来体会到的及现有的材料，作些说明。

河清先生：

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

迅 上 八月十四夜

（《鲁迅书信集》731封·1934年）

对鲁迅先生给我的这第一封信，我着重谈谈他是怎样对付敌人一九三四年在文化“围剿”中采取反动的图书杂志“检查”的新战略的。

先从信里的具体事情说起。鲁迅先生在《译文》创刊上用许遐笔名，译了俄国果戈理的一篇很有名的短篇小说《鼻子》，又译了日本立野信之作的短论《果戈理私观》，作为配搭。鲁迅先生写的关于这篇短论的《后记》，文章不长，指出作者的政治动态，文章的长处和可取之处，周到而精辟。

这短论后面的译者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原来都用

的鲁迅的名字，来信指示都改为邓当世。（《译文》为尊重原作者，本文题目下只署原作者姓名，译者的署名都放在文章的后面。）

这信里的“检查诸公”，是指国民党“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会”设在上海的“书报检查处”。这机关正式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何月何日，说法不一，暂且不谈。总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的图书杂志都早已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就被审查过了。我当时是《文学》月刊的编辑，对稿件被审查的事情，至收到这信时已有半年以上的经验，这点鲁迅先生是知道的。但这信里仍然指出：一、不要相信敌人的鬼话，什么审查标准“一秉大公，无丝毫偏袒”之类，全是鬼话，不要上当。二、要迷惑敌人，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使知道《译文》社有鲁迅先生在内，虽然这个秘密不可能长久保住的。三、对敌要小心。

鲁迅创办《译文》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天左右，《申报》副刊《自由谈》由张梓生接办，黎烈文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台。对此，鲁迅先生是很不甘心的，要黎烈文继续战斗下去。在他被迫下台不到一个月，在六月六日，鲁迅先生就写信给黎烈文，约他九日晚“惠临敝寓，除谈天外，且吃简单之便饭。”九日《日记》上也记着这件事。这夜晚的谈天，即谈创办《译文》。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邀请黎烈文为《译文》创办人。在《译文》创刊号《前记》里，因对付检查官，只是轻描淡写地写成偶然碰在一起，谈得高兴，就产生了这本小小的《译文》。

现在想来，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创办《译文》，首先是为

了建立一个新阵地，打击敌人和攻击旧思想。其次是翻译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同时翻制些外国的绘画，特别是木刻，作为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借鉴。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鲁迅书信集》898页）其三是纠正对翻译的不正之风，培养和组织翻译的队伍。最后，在战斗中讲道义，在策略上讲统一战线，支持被迫害的同人，让他继续发挥作用，并注意人的长处。

鲁迅先生着手编《译文》时的情况，《鲁迅日记》里记着：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晴，热。自晨至晚编《译文》。……胁痛颇烈。”热得怎样？鲁迅先生在八月七日致增田涉的信中，很有风趣地说：“上海又是九十度以上，鄙人正以满身痱子，作为光荣的反抗旗帜而奋斗着。”又说到当时的政治环境：“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凡是不愿当私人的走狗，有自己兴趣的人，较为关心一般文化的人，不论左右都看作反动，而受迫害。……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这是在编《译文》两天前的情况。当时“胁痛颇烈”，我看到《日记》后才知道。

鲁迅先生就是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大热天里编译好《译文》的。接着，大约在八月十一、二日，他请茅盾先生约我，在茅盾先生家里会面。茅盾先生住在大陆新村六号，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和鲁迅先生住在同一个大陆新村。那次会面，我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写的《鲁迅先生与《译文》》中有详

细的记载。其中写道：“鲁迅先生从前门进来，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短短的，腋下夹着一个用日本包袱包的书包。”那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天气很热，外面太阳猛烈的晒着，鲁迅先生脱下长衫挂在客堂门口角落里的衣架上，便坐下来谈话。一张方桌靠墙放着，我和先生对面坐，茅盾先生坐在中间，朝着墙壁。”我们“谈了一些时候，先生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译文》创刊号的稿子，以及制插图用的各种画册木刻。先生把稿子和画册等都交给了我，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名用几号字体，插图缩成多少大小，都已一一注明，总之差不多自前记以至后记，一切都编制定当。”（“鲁迅先生纪念册”第三辑四十九页）

这次会晤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如在眼前。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并没有谈到检查、化名之类的问题，因为鲁迅先生在《自由谈》发表的文章，全用化名，已习以为常了。《译文》创刊号九篇译稿，茅盾三篇，一篇用本名，两篇用芬君、味荅两笔名，黎烈文两篇，都用本名，瞿秋白一篇存稿，用笔名，鲁迅三篇，两篇用许遐、茹纯两笔名，只有立野信之作的《果戈理私观》的译稿，署鲁迅名。当时，鲁迅先生这样安排了，茅盾先生没有意见，我就准备按照鲁迅先生编定的去付排。稿子交我后，鲁迅先生大概想想自己还是不出面的好，十四日夜里马上写了这封信。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敌人虽是最高的轻蔑，在战略上把蒋介石之类只如实地看做一伙流氓加几枝手枪而已，但在战术上却决不轻敌。初战尤需郑重。鲁迅先生自己编的三期，他总共译了十篇，鲁

迅先生的名字，一次未露面。直到第四期，他才用鲁迅署名译了契诃夫的《奇闻二则》，这是几篇轻松的短篇小说。

当时我只是遵照指示办了，也知道这是对付敌人，但头脑里还没有战略和战术的观念。现在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看，鲁迅先生曾经把文化“围剿”中的检查问题，是当作敌人的新的战略来认真对待的。

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主将鲁迅先生，对小丑的新把戏，了如指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敌人的战略转变刚冒头，就被他抓到识破了。鲁迅先生对这反动的检查政策的新战略产生的具体过程和施行的情况，每一步骤都注意着，掌握情况，决定对策。真正做到他自己一贯主张的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

当第五次军事“围剿”时，敌方推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浙江国民党省党部一批党棍的反革命的嗅觉好象特别灵，首先在文化“围剿”上对杭州的书店开刀。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卅一日夜致曹靖华的信中，立刻反映了这文化“围剿”的动向：“日内又要查禁左倾书籍，杭州的开明分店被封了，沪书店吓得象小鬼一样，纷纷匿书。这是一种新政策，我会受经济上的压迫也说不定。不过我有准备”。这里谈的还是老一套的查禁。隔三天，十一月三日夜，致郑振铎的信中，又谈到此事，但比较具体了：“对于文字的新压迫将开始，闻杭州禁十人作品，连冰心在内，奇极，……茅兄是会在压迫中的，而且连《国木田独步集》也指为反动书籍，你想怪不怪。”接着提出一个特殊的新情况，“前日（源按：该是十

一月一日)潘公展朱应鹏辈,召书店老板训话,内容未详,大约又是禁左倾书,宣扬民族文学之类”。潘、朱是上海文化特务的头目,反动的民族文学运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所以鲁迅先生在会议内容未详的情况下,作这样的估计。到十一月五日,鲁迅先生就已进一步掌握了会议的内幕:这黑会“讨论”“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说这时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别的编辑们好象也无人反对,这提议完全通过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同日在致姚克的信中也指出:“这方法我看是要实行的,则此后出版物之情形可以推见。”(《鲁迅书信集》431页)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献检查之秘计”(《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先生也说过这不是在他做“《准风月谈》时期以内的事”。《准风月谈》作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到十一月七日,这献计是在十一月一日,其实是在那时期内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献堡垒之秘计的是柳维垣、戴岳(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献检查之秘计的,鲁迅先生也听到传闻的。虽则他也说,“即使没有某甲先生的献策,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鲁迅先生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回上海,到一九三〇年发起和参加“左联”后,他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鲁迅书信集》1152页)。但他的文章发表前须